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未来中国人口发展挑战

——兼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302

2011年5月14日星期六

演讲人：

**王 丰**

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郭志刚**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曾 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

2011年5月14日

## 会议记录

**王丰：**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嘉宾，我们开始今天上午的研讨会。我是王丰，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清华大学的公管学院的访问教授。我首先代表胡鞍钢老师，他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知名的国情研究专家，对大家表示欢迎，特别对今天能够来参加今天上午研讨会的各位专家和嘉宾，表示感谢。

下面首先请胡鞍钢老师给大家先做一个发言，以后请郭志刚老师做发言，曾毅老师，还有公管学院其他的几位老师，杨燕绥老师、刘生龙老师，还有周绍杰老师他们都有一些发言。我希望在此之后有时间大家能够共同的进行讨论，同时能够回答一些问题。在请胡鞍钢老师讲之前，在这儿要讲一下，我们清华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有多方面的合作，成果之一就是胡鞍钢老师最近的一本书，叫《中国2020》，是由布鲁金斯出版社上个月刚出版的。这是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思想家系列》的第二本，第一本是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祝贺胡鞍钢老师的书在布鲁金斯出版社出版。下面请胡鞍钢老师发言。

**胡鞍钢：**我尽可能快的做个简要的介绍，题目是《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来看中国人口的变化》。首先看总人口情况，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表明我国大陆人口达到13.4亿。我本人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专家，参与了十一五，现在又参与了十二五。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实际上是总人口的数量。如果总人口数据准的话，可能政策方面会出现比较大的误差。十一五提出的目标是13.6亿，但是现在看来实际结果控制少了2028万人。即便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一个基数，应该是在13.41亿，那么实际上也比这个统计报告数少了128万。这就告诉我们，此次人口普查搞清楚了我们总人口的的实际家底，这样才能对未来的人口政策，包括相关其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在中国搞一个心中有数也不那么容易，后面郭志刚教授他们都会讨论这些问题。因此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其实我们是提前完成了，但是是不是人口数控制的越少就越好呢？这也是我们这次讨论的问题。这次人口普查，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也超过了我们前面参与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和人才规划的一些当时设定的数据。比如说从大学人口，也就是指大专以上的人口从2000万人提高到1.12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0.12%，我们经济增长10%，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高等教育人口高达10%，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之少见的。此外高中人口也迅速上升，从1.4亿人提高到1.88亿人，年平均增长率是2.94%。可以说都高于同期人口增长率。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确实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特别是这1.2亿人，我们查阅了一下，大体上是相当于世界的第十位国家。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根据中长期的教育规划，原来是到2020年达到1.95亿，现在看来保守了，可能会突破2亿大专以上人口，当然速度要比过去10年低的多。

此外我们看这两部分人口合计数也是相当可观的，从1.86亿人提高到现在的3.076亿人，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这在人类历史上，关于人力资本的发展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可观的。我们看看中国国民的受教育年限也是迅速提高的，从1949年推算下来是1.0年，1978年接近于4.0年，现在已经达到了9.0年。因此，也可以表明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的现代化的过程。而人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要增强人力资本投资，使得我们全体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

2011年5月14日

我们在这里可以进行地区间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地区为什么劳动力上升很快？比如说北京，在2003年它的就业劳动力是799万人，低于上海。但是到2009年突破了1200万，达到了1255万人，其中大学扮演重要角色。我们看一下北京的情况，它在1990年的时候，大专以上人口是100万，到了2000年的时候，达到了233万人。但是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617.8万人，尽管总数是低于广东、山东、江苏三个省，但是从世界城市人口中的大专以上人口，它已经超过了纽约，包括像东京，成为世界最多的。此外上海也是如此，突破了500万。也可以来说明，按照经济地理的规律，人口、劳动力和人才，包括高等教育人口是聚集在这些城市之中。当然北京也遇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口超载能力和水资源等等这些问题。

从人口结构，特别是人口的城乡结构来看，我们从这次公报获得很大的信息，结论就是中国正在经历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首先是家庭平均人口迅速下降，家庭户迅速提高。到2010年已经突破了4亿户。这本身也会对我们消费产生巨大需求。如果以住房需求为例，还涉及到跟住房相关的装饰、家居、电器等等，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10年中国的房地产，特别是住宅销售面积迅速上升，达到了10亿平方米。相当于美国高峰时期的三倍，美国高峰期，我们粗略的推算，因为它是按套，大体是三倍。相当于日本的10倍，也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房地产或者说住宅消费市场。随着这个过程，它不仅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也包括它的刺激消费过程。这个数据表明，中国确实在经历着最大规模的变化，在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只有1.72亿人，到2010年达到了6.6亿人，净增了将近5亿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这6.6亿人就相当于美国总人口的两倍之多。这也反映了中国迅速的崛起，还会保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此外，通过这次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根据它的统计口径，就是指居住地、户口登记地所的在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达到2.6亿人，比2002年增加了1.17亿，可以说增长了81%。这也是非常之可观的。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加速了地区间、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使得我们十几亿人民充分享受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就业自由，这从而也是一个最大规模的经济自由革命。因为有了这些经济自由，我们才能够真正解放生产力，也能够扩大我们的国内需求，也能够使我们的人民在过去很多年人力资本的迅速提高。我想这一点信息是非常明确的。

此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是要通过我们所说的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这个三元结构，实际上是在80年代就比较明显了，就是农村的非农产业，特别以乡镇企业为标志的。那么进入90年代的时候下半期，就开始进入到我们所说的四元结构，特别是在城市形成了大规模的非正规经济、非正规就业人口。这可能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独到之处，它不同于传统的发展经济的二元到一元，或者是传统的二元到三元，它是四元结构的变迁过程。因此，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告知我们必须朝着更加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包括城乡一体化、城市内部一体化、农村内部一体化，即经济社会一体化，它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人均收入的趋同化，这都是我们今后的一个方向。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公报告诉我们中国正发生一场革命，我们称之为经济地理革命，也就是重塑中国经济人口地理版图。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中国也有过总人口超过1亿的省份，就是四川，后来一分为二了。这次人口普查数据，广东省从2000年的只有8600万人，这次通过10年已经突破了1亿人，也意味着广东省居世界第12位，因为第11位是墨西哥，大体是1.12亿人。当然广

2011年5月14日

东不仅人口突破1亿，最重要的，按照汇率法计算，广东本身GDP去年已经超过世界经济总量的1%，我们称之为增长型经济体。因为只有超过1%，才有可能对世界产生影响。因此也看到人口分布的变迁也会引起经济的变迁。

此外，人口第二大省份是山东，也达到了9600万人，也就意味着高于我们所说的菲律宾的人口，在世界也是很显著的。当然河南从第一位就退居为第三位。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化情况来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城乡结构的变动过程，也是人口区域分布的重要驱动力。它的基本方向应该说越来越清晰了，也就是说人口不断地向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那些人口规模大，又比较贫穷的省份和地区流出。现在已经有五个省份在过去10年绝对人口是下降的，其他省份人口都是迅速提高的。其中提高幅度最大的就是广东，其次是浙江、上海、北京、山东、河北、江苏。可以看出来，几乎都是沿海地区。反过头来看，我们也看到少数的内陆地区，比如说像新疆个别的一些地区人口也是上升的。返过头来，我们可以看到湖北、四川、重庆、贵州和安徽，它的总人口绝对数下降了。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从2004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GDP，就是各地方的人均GDP达到高以后，而后下降，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所谓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老工业振兴这样的一些国家的规划。另外一方面来看，主要是我们的人口，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从内陆地区到沿海地区聚集。我们可以相信未来10年这个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这就顺着我们所说的经济地理的那个趋势不断地变动下去。

此外，这次公报首次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大陆的现役军人，以及在大陆的港澳台同胞数、外籍人数，可以说中国人口的聚集也相当多的聚集了海外的人员，超过了我们说的100万人，达到102万人。当然主要就是港澳台地区，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次也做了首次的普查，特别是韩国人居第一，美国居第二，然后是日本、缅甸，包括越南。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留学生的排序跟这个很接近，第一是韩国人，美国是第二，日本第三，当然也包括俄罗斯等等。这部分包括就学、就业，因此反映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我们希望加速吸引国际人才。

此外从今后的角度来看，我们也面临巨大的挑战，这包括不断加速的少子化人数，我们比较了中印，可以说在中印少儿人口，就是0到14岁，在1975年的时候，中国是高于印度的。而后中国大大低于印度，而且这个差距还会越显越大。此外就是老龄化，后面教授们还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详细的评论。这就是这张图的一个变迁过程，以及还有中印少儿人口的变迁过程图，如果做一下比较，我们少儿人口已经远远低于印度了。当然我们城市化的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印度。

我想讲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问题。这是今天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它的涵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现在已经得到了比较重要的共识，除了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以外，主要还是人口的红利，后面我会请和我合作的，原来是我的博士后刘生龙博士做一个简要的分析，今天也给我们最新的一篇没有发表的文章，我们把它称之为是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提倡计划生育，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平同志所主张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计划、生育的政策红利，我们把它称之为是政策红利的一个体现了。但是今天我们作为后人，虽然乘凉了，我们也很快会变为前人，就是怎么样为我们后面的后人能够栽树，使他们能够乘凉。

因此，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为后人乘凉而栽树，如何为后人缓解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这样一个趋势的转变，而进行调整，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生育政策，这里涉及

2011年5月14日

到一个不同的概念，从计划生育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要坚持。第二，基于国策所确定的具体的生育政策要做出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在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具体政策的目标，内涵、措施同样要随着时代发生变化，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否则的话，我们会陷入到教条主义的这样一个漩涡之中。我做了中国大多数的主要政策的分析，现在唯一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在30年前制定了生育的具体政策，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说我们今天也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它的背景是什么呢？其实在30多年前，党中央就已经高瞻远瞩的预见到30年之后，（我特意打出来了，就在这封信中谈到富有远见的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会缓解，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我们可以通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的公报告诉我们，也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我理解就是不同的、具体的生育政策。因此，我们通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所提供的信息表明，现在已经到了，我称之为最好时机调整生育，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了。我们作为学术界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也包括中国还要花一段时间来调整，后面的教授都会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谢谢大家。

**王丰：**谢谢胡鞍钢老师。今天除了胡老师之外，我们很荣幸请到校外的三位专家，我自己也是做人口学研究，我对这个历史略有了解，在中国做人口研究有三个重镇，一个是人民大学的人口研究所，一个是北京大学的人口研究所，还有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口劳动经济。下面给我们做评论或者是做发言的是郭志刚老师，郭志刚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国家很多基本的对人口的形势、政策的认识，都是出于郭志刚老师之手。比如说中国生育政策到底是什么政策？这方面郭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很有幸请到郭志刚老师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讨论。下面就请郭志刚老师讲一下他对这次人口普查的一些观察和一些评论。

**郭志刚：**大家好，有这个能跟大家谈一谈人口问题很荣幸。我想我这么谈，我们看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后，大家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因为我是做人口统计的教员，我想讲讲我的认识，我通过六普这个数看到了什么。六普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发表几个数，都是非常粗的汇总，刚才胡鞍钢教授从经济、教育、地理方方面面覆盖的比较多，我谈的非常窄，我只讲人口。

对于一个人口统计的研究人员来说，一个普查以后，我们会看这么几点：第一点，这个普查调查的总人口数跟我们的印象能不能对上，它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还是不到我们的预期。实际上没有到我们的预期，人数变少了，等于少了2000万，原来是13.36亿，实际上现在13.4亿。这是大家比较惊讶的事情。少了这些人什么原因？是死亡率太高了？还是生育率太高了？有不同的原因会导致结果。六普的老年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人数都比我们以前估计的提高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国家人口寿命在延长，而且这个延长的速度超过了以前的预期。

总人口数总体上减少，减少在哪里呢？减少在劳动年龄人口吗？也不是。我们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这次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数字要比以前的预期超过了1000万，这个数字很大，这个数字到底怎么回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老年人数是多的，劳动人口数也是多的，这个总人口没有达到预期，那么一定是出生人口。实际上少儿人口的比例下降的非常大，绝对数非常小。这是超出预期的。

2011年5月14日

我总结一下概括，实际上意味着我们以前的预期出问题了，我们以前预期大概不准，对于寿命的延长可能估计的不足，对于生育率显然是高估了，同时对于老龄化又低估了。有的媒体采访过我，已经在网上登出来了，我再重复一下，我认为基本的形势大概可以这么说，以前的生育率是严重高估了，老龄化是低估了，略微低估一点。严重高估生育率还导致什么呢？导致对未来的重大影响。刚才胡教授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过去老有一种概念，就是出生人口数少一点好，那么我们国家的总人口就少了，这个事情不能看绝对了。如果要看绝对了，就意味着我们自己消灭了自己的未来，因为今天的少儿人口就是明天的劳动力，就是支撑整个社会运行的人，那么它下降的太快，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而这个风险以前是重视不够的。

第二个事情，在人口六普公布上，还有一点我们没有想到，如果大家看看历年的老年比例、少儿比例这些人口比例、人口数，前面这些我刚才已经总结了，其实城镇人口比例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看2009年、2008年、2007年，大家马上可以看到，人口比例在最后这一年变化非常大。我举个例子，2009年公布的统计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年底是46.6%，但是这次普查公布是49.7%，一下一年当中涨了三个百分点，不大可能，显然是以前低估了，所以又出来一个低估。我想再多说几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常粗的数字，这个粗的数字，实际上是低估了，如果我们要是再分的细一点看，因为城镇化意味着农村人口走向城市。我们在做人口学的时候，一直都有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在迁移到城市的人当中，性别年龄分布到底是什么样的？绝不是农村人口每一个年龄组都按照同样的比例往城市走，因为大家能够看得到的，流动人口都是年轻力壮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不均衡的现象，农村留着老年父母和留守子女，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年轻人离开农村跑到城里来了。我想补胡教授一点，实际上拿脚投票的是人口当中的一部分人，而有另外一部分人没有能力拿脚投票，被留在农村了。

最后一句，假如说我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现在总体来看略微低估了一点，如果分城乡来看，由于年轻人拿脚投票了，所以要看城乡的话，这个数字至今没有公布，一定是农村的人口老龄化要比城镇的人口老龄化要严重的多。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新发现，从1990年的普查就是这样的情况，我相信由于这些年来2亿多劳动力人口进城，会使这个差距拉的很大，人们注重的城市地区的老龄化，本来认为老龄化跟生育率联系，跟寿命联系，现在因为年轻人口一进来，其实城镇人口老龄化被缓解了，被外来人口缓解了，而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反而加剧了。这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人口发展、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要是这样发展下去，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非常严重。谢谢。

**王丰：**谢谢郭志刚老师。下一位请曾毅老师发言。曾毅老师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曾毅老师现在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研究员、教授。曾老师在做现在这个位置之前，也曾经在北京大学的人口研究所做了10多年的所长，也是在这边组织领导当时国内一个最活跃、最重要的人口研究机构，曾老师在人口学方面做了各方面的研究，最近这些年特别对老年人口健康做了大量的多学科的研究。下面请曾毅老师发言。

**曾毅：**非常感谢胡鞍钢老师邀请我来做这个发言。下面我想接着胡鞍钢老师最后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对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我们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来看生育政策要不要调整？一个终极目的就是生育水平到底有多高？在六普以前，很多研究认为我国总生育率大概在1.5到1.8之间，六普数据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我可以引用一下

2011年5月14日

2005年我们做的一项研究。当时经过各种分析，估计2000年主要生育率在1.63，预计2010年为1.61。前一段的争论，说中国生育率低了，该下结论了，现在处于很低的生育水平。

下一个问题，在这么低的生育水平上，咱们是不是还要继续执行现行政策？大家都知道，六普数据比较笼统，过去10年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未来几十年这个速度将会更加加速。从2030年开始，我国的劳动力每10年减少1亿，从2013年开始，最年轻，可以说最有创造力，24岁的人群，到2030年要减少，接近老年的劳动者要大大攀升。如果现行政策不变，那么我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2030年将要达到28%左右，将要达到总人口的9.1%，是2000年的9倍。供养一个老人，平均两个劳动者供养一个老人。老年负担等于4倍。

另外，保持现行生育政策，将继续产生大量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是个高风险家庭。而且按照我们的家庭人口预测，由于子女短缺，造成2030、2050年独居老人比例成倍增长，就是独生子女政策不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现行的生育政策助长了大量的独生子女现象增高。在1982年的时候，出生性别比基本接近正常，2000年大概是117，2007年达到了125。

六普的出生性别比还没有公布，但是现在看来显著高于2000年的水平，有人说在118、119，我们再等待一下。2003年开展关爱女童行动计划，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是否与现行生育政策有关？另外，我国执行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生二胎，出生性别比是124.7。另外全国有四个地区80多万人口，实行两孩政策，20多年出生性别比一直增长。也就是说客观事实摆在这儿，两孩政策的提出，性别比增长或者是继续增长，一孩半或者是一孩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为什么呢？其实仔细想想，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孩半政策，实际上是告诉群众，头一胎生男孩就不要再生了，生个女孩不够，可以再生一个。这在实际上就是用这种形式暗示群众，一个男孩顶两个女孩。

另外，一孩半政策提出，它本身的性别结构性在减少，一孩是男孩，这些人可以对出生性别比政策做贡献。所以这种结构性政策，我们用数学公式已经证明这一点了。另外，生育水平如果大大低于登记水平，更年轻的人数大大少于更年长的，这样使未来新郎短缺问题更加严重。这个我们也做过一些预测分析，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出生性别比也不变，那么假定实行两孩政策，也假定出生性别比不变，可是它未来45到49岁找不到妻子的比例，两孩政策政策要低很多，从这个角度，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另外继续实行现行生育政策，管理成本与政治代价非常高。因为按照现行政策，对于独生子女的父母，年满60岁要补贴，那么在两孩政策下，现行政策不变条件下，要多支出1.12万亿元。还有所谓大量非法生育的孩子。所谓非法生育，在七个省，有一个省里面超过12，有50%的小孩是非法黑孩子。生育政策调整对这些地区，实际上给这些小孩摘掉黑孩子的帽子。

现在呼声最高的就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一孩半政策还是要继续保留，出生性别比偏高继续存在。另外双独夫妇抚养四个老人、两个小孩，单独夫妇抚养三个老人、两个小孩，等于2倍、1.7倍，这实际上又产生了新的社会不公平。另外也许会酿成现代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人口经济学里面的所谓紧俏质好商品的心理导向作用，滋生超声造价和罚款钱财受贿等诸多腐败土壤和党群关系紧张继续存在，加大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问题。

2011年5月14日

下面简单汇报生育政策适当时期调整的策略问题。放宽政策能不能够平稳过渡，突然全面放开，这样也可能出现新的人口问题。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咱们是有办法的，那就是用晚育间隔的办法，可以帮助生育政策调整。生育年提高0.1岁，实际生育率下降4%。所以如果实行这个办法，适当晚育间隔，实行两孩政策。在两孩政策下，劳动年龄人口比一孩政策要好的多，老年人口比例也比继续实行一孩政策要好的多。那么实现两孩政策以后，我国2030、2050年总人口比现行政策普遍要多出5.6%与15.5%。有一个问题，总人口对资源的解决、环境保护，会不会造成影响？我们的答案是不会。大家可以看人均水资源，这是执行两孩政策的情况，过去60年，人均水资源大幅度的下降，实行两孩政策以后，它在2039年以前，下降以后会上升，因为人口总数开始平缓下降。这是人均耕地，也是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实行两孩政策，绝对不会造成资源、环境的破坏。

政策建议，就是尽快平稳过渡到适当晚育间隔的前提下，城乡互补，用经济社会激励机制，对于遵守剩余间隔给予表扬，不符合间隔的，不要罚，有的人会以间隔不够的名义去流女保男。大量的调查数据证明，五年之内，一两孩间隔越长，第二孩死亡率越低，母亲31岁以前生育二孩年龄越高，第二孩的死亡率越低。当然只是在31岁以前。超过31岁以后，死亡率就有所增长。所以说适当晚育间隔，不但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也有利于群众的切身利益。四个地区800多万，试验20多年，非常成功。

另外，放开生育政策的目标人群，就是27—30岁两孩生育年为主。2013年是低谷，2015也是比较低谷，2015年以后要攀升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错过了30年最好时期，还有五年起步，是生育政策调整，平稳过渡的较好时期，如果再等5年、10年再去调整，新出生的人口比例，到了20年以后，那个时候的劳动力短缺，综合因素在一起，那就是雪上加霜。谢谢大家。

**王丰：**谢谢曾毅老师。下面我们请的发言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经济人口研究所研究员都阳教授。刚才曾老师重点讲了生育政策，就像刚才胡鞍钢老师讲到的，现在人口的变化，是一个全局性的变化，它的影响也远远不止是影响到人口行为，影响的是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状况以及发展的趋势。下面很高兴请到都阳老师参加这次讨论。下面请都阳老师发言。

**都阳：**首先非常感谢王丰和胡鞍钢老师邀请我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刚才听了郭老师和曾老师、胡老师的发言，我自己也很受启发，学到了很多。我不是做人口方面研究的人员，我想从我们做劳动经济学的一个劳动经济学家去看这次普查的结果以及我们做了一些思考。

首先这次普查对于我们做劳动经济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掌握信息的一个机会。我们知道中国现在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未来10年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其实以前也提战略机遇期，但是我们对这种目标和约束的这种表达，实际上有时候并不是很清晰。为什么说未来10年是特别重要的时期呢？我们看到人均GDP的国际比较，或者是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发展的经历就知道了，未来10年，我们的人均GDP，如果要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国家，它就发生在未来的10年。根据国际经验来看，在这个时期顺利过渡了，保持了我們以前的增长的情况，我们就成为了一个高收入国家。即便出现像日本失去的10年，其实也不重要，因为人民已经富裕了，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如果说我们没有跳出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那就可能像其他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徘徊很多年，也会因为徘徊带来很多社会经济发展的問題。



2011年5月14日

在未来10年当中，发展的重要性也给我们看到了我们掌握人口基本国情的信息是多么重要。大家对于人口普查的数据，无论是从人口研究，还是劳动学研究来说，光看这几个大数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特别是更长远的一些信息。但是我初步的印象，其实跟我们很多人口学家的预测并出现太大的差异。

第二点，六普验证了我们以前对人口态势，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对于基本面变化的一个判断，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国家投了这么多资源，收集了这么多信息，现在我们有信心去说我们以前对于人口的看法。

第三个方面，从劳动学角度来说，或者从人口学角度来说，我们以前很关注老龄化，包括人口红利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存在了一些小的理解的偏差，比如说大家对人口红利的理解，好像说劳动人口比例还是绝对下降，或者是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开始绝对下降，是我们人口红利开始真正消失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完全这样的。我们再观察中国最近几年的现实，实际上它已经加速在发展了，出现说对劳动问题的影响。刚才郭老师和曾老师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劳动年龄人口，从新加入的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年轻的，数量已经在下降了。这对劳动供给产生了影响，我们很不奇怪，我们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就必然面临劳动力的短缺，面临着普通工人的迅速上涨。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使人们改善福利，工资增长肯定有好处，但是也不能不说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发展本身所产生的冲击。

在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我们也把中国跟其他的经济体做比较，比如说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在研究这个转折点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强调人口因素在当中发生的作用。日本也说他们以前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实际上我们考虑到这个因素，因为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人口转折，我们人口转变比较迅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已经面临了人口结构变化所引起的新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的局面。别的国家可能是由劳动需求拉动的转移，我们是既有需求增长快速，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这使得我们有着更加快速的转折，挑战也更加明显了。为什么？如果说纯粹的需求因素的话，可能劳动价格信号可以逐步引导我们的经济转型，我们经济结构可以转型，这样的话，我们会缓慢的或者是相对长的一个调整时期，但是我们加上人口因素的分析，刚才郭老师和曾老师都展示了这个图，我们会在供给面也会出现快速的推动因素。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我们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会比别人有更短的时期，我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在未来10年里面做出很好的政策回应。

第四点，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人口因素更多的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或者说六普给出的这些数，只是给大家更加强烈的一个信号，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警示的作用。我们对于未来的政策，或者说经济发展的政策，更多的是怎么顺应这种人口因素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以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去顺应这种变化，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经济平稳过渡，或者是保持尽量长的一个高速的增长期。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未来10年它最大的挑战在于未富先老。这个挑战当中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实际上是生产力，特别是劳动生产力。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老龄化，未富先老的老齡化，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危机。不管是从资源角度来说，还是从制度设计角度来说，我们养老制度设计是一个方面，但是养老制度其实并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无论如何你设计什么样的制度，都需要用现在的年轻人来养现在的老人，这是中国跟小的经济体很大的

2011年5月14日

不同，比如说新加坡可以用国际的资本市场去养活新加坡的人，但是中国肯定不可以的，所以你必须以中国的年轻人来养中国的老人。中国的年轻人养中国的老人怎么养？必须要提高年轻人的劳动生产力，所以这个问题是核心。从劳动市场结果来看，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提高，竞争的优势会相对削弱，特别是劳动密集的。这个时候怎么也对变化？只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附加值的经济结构，高附加值在经济当中占更大的比例。它的核心也是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

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个问题，可能是说未来随着不断生产力的增长，但是落实到当下，就是刚才胡鞍钢老师提到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把前面的变化看作是一个人口红利的话，现在我们怎么去让后人乘凉，其实就是应该提高人力资本。只有现在的这一部分人，现在还是在接受教育的人，未来成为劳动力的人，我们让他有更高的人力资本的话，在未来才能把这个树栽下去，才能在未来让他们乘凉。所以说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整个教育制度的改善，不仅仅是随着经济发展，应该说越来越重要了。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求程度总体提高，我们看到胡老师展示的数据，因为一些因素的出现，导致我们可能面临的挑战更加剧烈了。比如说普通工人工资开始上涨，但是这会产生一个很强的激励，实际上增加了当前正在受教育人的机会成本。一个孩子初中没毕业，就可以到外面去包吃包住，正常给一两千块钱，那么就有很强的动机去辍学，这对于现在来说不会出现大问题，但是在未来，当我们经济结构需要转型的时候，我们的工资涨到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有竞争力的时候，这些孩子能不能适应未来的需要？所以我们很多政策就非常紧迫了，比如说增加义务教育的长度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而且也是一个比较紧迫的政策。

还有一个政策方面，刚才曾老师和郭老师也提到了，政策本身它需要分解，年轻的，能够适应现在经济生产需要的这些劳动力，他在城市化进程中，在就业非农化政策中，已经比较充分了。我们未来的政策可能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应该是以鼓励人的转移为主，而是说既落实他们在城市的更好生活，更好的融入城市，也让那些留下来的人有更好的社会保障，所以像留守儿童公共服务、留守老人的社会保障等等，可能要跟以前促进就业的政策并举，未来政府提供更多信息的时候，会给我们政策转变提供更强的信息和支持。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政策。谢谢。

**王丰：**谢谢都阳老师。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有时间的时候，都能够回来进行讨论。现在学院里面几位从事跟人口变化有关的几位老师在场，所以我们请几位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先请杨燕绥老师发言，然后是刘生龙、周绍杰。杨老师，我们国家在推动社保改革、养老的时候，我恐怕想不到第二个更重要的声音，作为我们这个学校的教授，杨老师自己也有一个养老中心，组织很多各方面的研究，下面请杨老师发言。

**杨燕绥：**我把前期的研究成果跟这次人口普查对接以后的一些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从我们前期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人口的模型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到10年，我们的人口模型反映人口是13.43亿，跟这次的结果比较吻合。也正因为基于这样的人口测算，我们在08年向总理报告了中国未来养老金制度结构调整的报告。在09年给人口计生委完成了关于计划生育内涵变化，从一个家庭一个小孩，变为真正的有计划的生育，给育龄青年一个普遍的社会保障、人口保障，来调整人口生育的动机和行动，消灭孩奴的社会现象。

从09年开始，我们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人口统计看到了刚才各位老师讲的情况，在第一人口红利平滑下降的过程中，怎么用我们的公共政策把老龄人口的红利开发出来，它已经不是一个简

2011年5月14日

单的人口结构，它需要方方面面的政策。比如说老龄人口到2020年，或者说2035年，那时候老龄人口，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到27%，刚才曾老师说27%，甚至到30%的时候，我们的产业结构已经实现了70%以上为服务业，那时候30%的老龄人口没有购买能力，我们70%又是服务业，没有人去购买服务业，谁来购买？如果我们的老人都像现在县级水平供养老人，我最近在湖南调研，我们一个县委书记说，我们现在供养老人跟养猪差不多，就是能吃饱、睡觉。我们如果将来还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不需要上大学了。经济平稳加快发展的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我本来是研究养老金的。但是养老金最需要研究人口，人口一统计，就使我看到了很多问题，越看越紧张。我们前期这些数据也在发表，有关部门也说我总在这里说狼来了，但是现在看来只是狼比我们想象的要肥。刚才各位老师讲到的问题，我们再深入一步讲，就是老龄人口赡养的问题。中国整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下面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调结构。实际上人口结构告诉我们很多问题。从这次六普的数据来看，原来的计算模型是准确的，但是从出生人口的变化，也比我们原来看的更严重了。所以劳动人口的数据，有可能要比这个下降的还厉害。我们按照原来的预测，一年增加1000万人口的情况，现在看来10年增加了7000万，一年的人口只增加了不到700万，实际上比原来预测的要小。第二条，绿色的线还要下降的快一点，尽管当前看的是准确的，今后它要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这个还没有算出来。

我们按照原来的预想，到2035年左右的时候，2015年前后，劳动力开始下降，这已经是事实了，到底它是不是刘易斯拐点，还要综合论证。到2035年的时候，老龄人口到顶峰，但是后面这个峰值是不是还在往上走？如果继续往上走，顶峰还不在这里。这是第一个高峰出现了。从表面来看，在顶峰的时候，人口统计的赡养，就是劳动对老龄人口，先不说小孩，这涉及到两代人之间养老金制度安排问题。假设我们把这个点定在2035年，那时候2.7个劳动力对一个退休老人，这是15岁到64岁人口对65岁的人口，我们后来在统计赡养率提出了实际赡养率，把15岁到64岁人口当中的四种人减掉，第一种人就是在校生，第二是失业，总是要有失业人口，肯定不是4.5%，我们按照5%的失业率减掉了，实际上事实比这个严重的多。第三，低收入。我们按照2000元作为纳税起征额，如果以后提高到3000，那么这个数据又加大了。第三，提前退休。65岁以前退休的都视为提前退休，中国实际上合法退休的是60岁，实际上是48到50岁之间平均退休年龄，我们过去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很多人提前退休。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要解决40、50就业，还得就是50、60就业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把这四种人从15岁到60岁人当中减出去，我们用的是保守口径，如果这四个因素再放大了，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还严重，这是我们对实际赡养率研究看到的问题，真的不是说狼来了，狼已经来了。谢谢大家。

王丰：下面请清华大学公管学院的刘生龙发言。

刘生龙：我今天主要是来学习的。我主要是把我跟胡老师，利用最新数据研究的有关人口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做的一个测算结果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现在大量的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实际进行了一个解释，包括制度改革、比较优势等等，我想这些研究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把人口因素都考虑进来了。围绕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过去的文献中，也存在着很多的争议。比如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部分结果是互

相的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人口老龄化会更多的抛去劳动力资本，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是一个倒U型的，

人口老龄化通过改变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和劳动年龄结构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上，测算出来，有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增加，或者是人口抚养比下降，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间的波动，在研究劳动年龄份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出生率。很多人在控制出生率的时候，没有把出生率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放进来，这里面有一个内生性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对出生率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这个文章中，我们把出生率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放进来考虑。

有关出生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出生率和人口增长，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降低被认定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这个是从马尔萨斯来的，人口增长对控制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确实发现出生率或者是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是有负向影响的，但是正如李红斌和张建生（音）他们在一篇中提到，证明就是一个内生变量，所以仅仅指出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而没有指出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把出生率跟人口结构变迁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来加以考虑，以及他们之间的联合影响。

理论模型的结论，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对GDP和出生率，劳动年龄份额对它们都有影响的。我们在实证模拟中，分成五年期平均经济增长率，人均实际GDP对数、储蓄率对数，主要的解释变量是滞后5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对数、出生率的对数。

重点解决了出生率内生性的问题，以人口占总人口的份额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份额作为出生率的工具变量。中国的人口政策不是一刀切的政策，在农村里面，它实行了一孩半，对于大部分的少数民族来说，是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变量作为出生率的工具变量，来用工具变量法对这个参数进行估计。

实证结果，基本上能够支持我们前面的理论模型的结果。当出生率和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同时进入增长回归模型之后，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提高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如果不引入这个，我们发现它前面不显著，后面就能够显出来。引入出生率，它是非常有必要的增长回归模型。如果出生率下降，使得劳动年龄份额提高的话，人口老龄化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它们之间有一个平衡的关系，如果说老龄化提高的非常快，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之间有一个平衡，使得中间有一个增大的关系。

主要探讨增长回归的结果，我们这个结果显示，出生率的下降，出生率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13.9%，这个结果当初和别的结果做了对比，他们计算的结果是11%，我刚开始也跟周绍杰探讨过，我们后来发现之所以我们的结果比他们略高一些，在我们的样本里面，我们用的数是1983年到2008年，五年人口出生率是下降千分之一点三，在他们的文件里面，是1978年到1998年，他们是每隔五年人口出生率降低是千分之一。我们人口出生率在最近几年里是一个加速下降的趋势，人口出生率下降对经济增长有一个正向影响。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2011年5月14日

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到了30.7%，也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一。另外一个发现，采用工具变量法之后，人口密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三者因素合起来是26.2%。我们通过这个水平，对前面的增长回归进行一个佐证，我们对数是人均GDP，解释变量是对数出生率和对数的劳动年龄人口份额，这样的话，我们对数应该是一个弹性。通过这个弹性，我们可以再次计算出出生率和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增加是28.7%，和前面的30.1%相差不是很多。出生率下降达到了17.1%，比前面稍微高一点，基本上还是和前面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最后我们也研究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出生率的影响，我们的结论是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贡献很高，出生率下降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作用，我们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出生率它的下降空间有限，因为重要的出生率下降到千分之十三到十四，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加速的过程。未来的人口结构变迁，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来说，不利因素大于有利因素。作为经济学研究，我们不能否定人口政策，我们认为要实施调整人口政策，但是关键还是TFP的提高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王丰：**谢谢。我们本来有更多的时间，是一种不同的形式来讨论具体的研究，我们在座的其他专家也可以讨论问题。我们以后可以想办法通过学术活动，大家可以更深入的讨论这些具体的研究。下面请清华大学公管学院的周绍杰教授，请他讲一下储蓄。

**周绍杰：**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很多在研究人口方面的专家讨论一些问题。当然我本身不是研究人口问题的，而是研究人口因素对一些经济变量的影响作用。我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储蓄率的问题。

实际上从2000年以来，中国储蓄率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研究的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很高，09年中国的储蓄率达到了53%，这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高的。而且中国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足以证明储蓄率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对于人口的认识，我本身其实也并不是深入的，但是对人口总体来说，主要从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人口规模，我们以前基于一孩的人口政策，主要考虑是在人口规模这块。刚才曾老师做的研究表明，如果实行两孩政策以后，可能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压力没有那么大。我想，从人口政策调整来讲，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了。但是我想其他的三个结果性问题是更为长期的。第一，城市化的问题。现在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关于流动人口数据并不是特别详细，我记得05年的时候，公布流动半径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数据很重要，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跨省流动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会变成什么样，这个不太清楚。刚才也是受胡老师的启发，06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趋同的问题，这可能是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也可能是人口流动造成的。四川、河南实际上是人口在外流的过程，经济发达地区处于人口集聚的过程，这个很重要，这个实际上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第三个，老龄化的问题。像刚才都阳老师讲的，我们现在老龄化，是一定既定的问题。之前我用的联合国的数据，也是比较粗的，当时看到2010年实际上是15到64岁人口比例达到了峰值。我不知道那个数据有多高，但是现在我们老龄化的趋势已经是特别严重了，因为我用城市调查数据发现，实际上劳动人口数在显著提高了，从1988年的37岁到现在已经达到了45岁，所以老龄化并不是单纯的劳动人口结果的变化，这个已经是很确定的一个趋势了。

2011年5月14日

我最近和另外一位教授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在2038年的时候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时候。这个也是基于联合国的数据。我们当时讨论对国民储蓄的影响，传统意义上来讲，日本上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我们现在看日本，实际上它的家庭储蓄率跟美国差不多，也就是3%到5%之间。我们现在用不同的数据测算中国的储蓄率，实际上差距很大。总体来讲，储蓄率是非常高的。实际上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在不断作用下，中国的这种储蓄问题，家庭储蓄的能力可能会不断下降。最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养老问题，就是社会保障如何去弥补在家庭储蓄率的下降。

还有城市化的问题，实际上胡老师讲的，我们住宅面积增长的很快，我个人的一个简单的计算，99年到08年这10年间，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有一半以上跟购房有关系。我们整个储蓄率的变化，它不单是人口的问题，实际上更多是我们现行的住房政策问题，这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第四个问题，人口的性别比例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评价一项政策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评价标准，比如说原来的人口政策，是基于资源的承载能力作为标准。如果再换一个角度，我们看老百姓的幸福水平来讲，这可能也是一个衡量标准，因为刚才曾老师的数据也提到了，09年的统计数据，0到14岁人口中，男孩、女孩比例是124:100，这些人口长到成年以后，可能有20%的男性找不到对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研究性经济学的也发现，结婚的要比没有结婚的幸福的多。这种结论是很多的。这个不单单是幸福的问题，而且事关社会稳定的问题。我们在衡量人口政策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权衡，比如说结构、老龄化、性别比例的问题。而且性别比例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最近有一篇文章研究性别比例对储蓄率的影响，而且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实际上也被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引用了，他认为中国储蓄率的提高，尤其是农村储蓄率的提高，是因为中国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性别比例失调会导致婚姻市场上出现一个竞争的局面，对于男孩家庭来讲，他要积累资产，为了他的子女在婚姻市场上赢得更大的成功机会，所以它传导机制是这样的。性别比例失衡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如果出台两孩政策以后，它可能会存在一些政策问题。第一个问题，可能会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比较大的冲击。女性如果生一个孩子，或者是生两个孩子，对女性的劳动供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本着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影响可能是必须实质的问题。另外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像刘生龙研究的，包括胡老师研究的一些结论，实际上中国TFP已经在往下走了。往下走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跟我们走向资本密集型的发展趋势是相关的。但是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经济结构，可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过程。一旦到了服务业主导的时候，它的经济增长就不是那么快了。整个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包括生育率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这个是不确定的，而且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接着郭老师谈的老龄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我相信农村地区的老龄化肯定严重一些，因为农村的这种高人力资本一定出来了，但是城市的老龄化也比较严重。比如说北京、上海，他在北京工作置业的话，他生一个孩子，他一定会从家乡带来一个老人，整个对大城市来讲，整个老龄化也比较严重，相对来说中小城市老龄化要缓解的多一点。整个分析人口政策的时候，除了我们对总体数据把握以外，其实我们更多的要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包括总的生育率，现在总的生育率，我相信可能是1.6左右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数，但是将来总的生育率的区分，可能还要进行一个

2011年5月14日

年龄段，比如说每隔五个年龄段，看看他出生在不同年份总的生育率的变化怎么样。这样可能对总的生育率变迁，对它本身造成的影响，可能会有一个更加细微的政策的影响。

另外谈一下转折点的问题，刚才都阳老师都讲到了，现在讨论也比较多。我也比较相信蔡教授的一个研究，刘易斯转折点，它不单单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政策市的一个结果。一方面我们的生育率依然很高，另外就是低技能的工资增长很快。按照原始的刘易斯拐点来讲，在劳动力增长同时，供给增长同时，实际上工资也在增长。这个也跟我们国家政策有关系，中央政策一直在想，我们要把就业放在第一位。但是从实际考核来讲，我们从来没有说一定要各个地方公布失业率，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失业率高，对他们政绩没有什么影响。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政策或者说不一致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可能中国现在劳动力的转折点，更多的是一个城市化推动的过程，或者说低技能劳动力在城市里生活质量不断攀升的一个现象。现在低技能劳动力上升，并不一定预示着是劳动力转折点就到了。中国劳动力转折点，可能不是现在，可能是以后的事。这个时候也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公共服务的问题，因为胡老师也讲了，人口政策是全国最大的政策，我们将来应对人口政策，它不但是生育政策，而且还应该考虑到一些公共服务的问题，这个对我们将来政策调整，实际上降低人口问题对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负面冲击的一个很重要的着眼点或者是考虑的一个方面。

王丰：谢谢周绍杰老师。刚才胡鞍钢老师叫我最后结束的时候，再做个总结。我觉得刚才周绍杰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讨论了，所以我就不占时间了。有四个图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讲学风不能抄袭别人，这四个图里面有三个都是蔡泳（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拿来的，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胡鞍钢老师也讲到了，就是中国省际人口的变化。我们往往过去把人口只看成是生育政策，把人口当成一个变量。人口作为基本的国情，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像马建堂局长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讲到了，我们现在进入了低生育、低增长率的时期。

尽管普查的数据不多，但是这在过去10年，是第一次在中国过去60年中出现的中空的现象，中国的中部开始变空，中国红的地区，中间地区开始人口减少，这些省份的减少，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沿海一些地区和大城市人口开始进行迁移，如果这今后是一个趋势的话，对中国整个人口和经济布局会有很大的影响。全国人口，65岁以上老人有8%之多，四川是流失人口的，他们65岁的老人已经到了11%，远远高于全国水平，江苏也到了将近11%，这是人口没有增长的一个省份。像北京、上海，老龄人口比例在下降。

第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需要家庭，需要社会，需要国家这三者共同来考虑我们现在人口的变化，这个图也是蔡勇做的，在2005年的时候，用2005年小普查做的各省35到49岁的妇女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是没有孩子的比例，2005年当时是37%。这些人在现在都是40岁到54岁，这些人不会再生孩子了，在全国有将近40%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或者是没有孩子。要是看全国的城市，按照城乡分的话，全国城市将近有70%的妇女是没有孩子，或者是只有一个孩子，在35到49岁。这是5年以前的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出来以后，我们会有数据对这个进行更新。

最后一个图，我们现在讲抚养比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数据，有的用15到64岁作为劳动人口，把65岁以上作为养老的。如果说过去生育率在1.6，现在普查数据出来以后可能不到1.6，我们拿这个做预测，在2000年，往回走10年，对每一个60岁以上的人口，有将近六个是在20到59岁，

2011年5月14日

为什么要用20到59岁？一个是这些人都参与劳动活动，还有考虑到纳税，20岁以下的人纳税，机率很小。这个没有杨老师讲的狼那么肥。拿这个比例，而不是用15岁到64岁简单的比例，我们从2000年将近6个，到现在的5个左右，20年会变成2个。这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从五个纳税人相对于一个60岁以上的，而且这个时间很快，只有20年的时间。金砖四国，我们跟俄国很相近，但是比巴西、印度变化要快的很多。其他的我就不讲了，我想问第一个问题，不局限于刚才发言的，胡鞍钢在开始的时候讲，过去30年一直再做政策研究，就一项政策没有变，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同时，我们通过这次普查可以看清楚，我们过去对一个基本的国情，就是人口的数据，一直出现错误，对生育率的严重低估，导致一系列制定政策的失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谁来负责任？为什么会一直有这种基本的情况摸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谁来负责任？

**胡鞍钢：**今天还有一些在座的媒体，对这个问题我做一些讨论和分析了。公共政策分两个层次，其实这个看的非常清楚。第一个层次叫计划生育，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第二，计划生育的具体政策。从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改革开放是基本国策，但是到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策，尤其是具体政策，就是它是适应性的来进行变迁，我们称之为一般是继承，然后创新。我们专门对规划做过评估，现在看来，大家认为我们基本国策等同于现行的生育政策，其实实行剩余政策是1980年制定的，这就把这两个问题给混淆了。实际上从政策研究、政策分析、政策调整的角度来看，确实要把这两个东西相对分开。为什么这个政策30年来没有进行调整呢？首先是我们有关部门，包括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没有很好的研究为什么在30年前党中央提出一定要在30年之后有所缓解。2009年经济参考报11月26号那篇文章已经提醒决策者要有这个历史记忆。第二，要兑现历史承诺，我们并没有说调什么，而是说一定要调。怎么调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曾教授提出软着力，可能郭志刚教授提出其他的方案，包括不同的部门，没有关系。我们需要对这样重大决策进行三化，一化就是同步化，要不同的地界，我们叫先民主化。第二化，要科学化。作为做的研究，必须有不同的扎扎实实的这种科学研究，我们看十二五规划基本上每个方面都是这样做的。第三，程序化。因为重大决策，像十二五规划，经历了11个步骤。前面我主持和参加了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我们归纳为九个步骤。唯一在这次人口政策没有经历过我们说的首先是民主化、科学化，科学化也有，就是前年写的人口战略分析报告，但是没有进入到一个程序化。因此，始终在这样一个重大决策方面来看，整个中国的公共决策在三化，但是唯一的是在这个领域始终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过程。为什么今天要开这个会？就是感到它的这种紧迫性和现实性，刚才杨教授讲到了，这个狼是真狼，而不是肥狼，比原来设想的问题更加严重了。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开这个会的主要目的。

因此，现在提出我们称之为调整政策是必须的，刚才我对曾教授讲的做一个评论，他已经讲到了一个机会窗口，我们称之为是2008年到2013年，因为曾教授提出这个建议是在2005年，我们很清楚，而且我本人也通过研究，我支持曾教授提出的所谓的软着陆这样一个词。当然我们讨论的政策不仅仅是人口生育政策，还相关到其他的经济、社会政策，这个会已经表明了，比如说如何提高TFP。包括周绍杰教授，他们都提出这样的核心问题。

此外，这个政策还涉及到很多，比如说要不要调整退休政策？那个退休政策又是我们建国以来唯一没有发生变化的。在不同的发展条件下，你仍然按照原来的退休制度，这很显然是不适应的，也不适应现在的人口问题。所以这些重大问题，有赖于我们通过公共政策的民主化，首先生育政策不是政府决策，我们叫公共决策，我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讲中国决策机制如何从国家决策到公众决策。同样现在的生育决策就是要拿到桌面上来，首先定位为公共决策，因此需要有



2011年5月14日

不同的学者各个方面来参与，包括将来涉及到退休政策同样如此，我们可以通过辩论。如果没有这三化，它就没有办法去适应现在的人口变化。

**杨燕绥：**为什么是这样呢？决策体制的问题。现在的决策是政府部门决策，一个部门的利益，一个是部门的短期。今后怎么办？这一定变成社会决策。计生委学者的意见他们也很同意，但是他们现在想的一步留神被发改委合并怎么办。这是决策体制问题。

**王丰：**现在有没有问责制？

**胡鞍钢：**客观的说，十一五规划，当时还不叫人口委员会，还请我咨询了一下，我的观点比较明确，后来十二五他们就没有找我。不是说没有专家，他们是有选择性的。我刚才特别强调了，这个决策一定是公共决策，它不是国家部门决策。

**郭志刚：**我补充一句，我们在这儿讨论，给媒体来提供的塑料，应该首先是事实。然后再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其次。我想说一件事，刚才曾老师讲的时候有一个表，不知道在座各位看明白了没有，就是国家发展战略人口预测和他建议的预测，最后在总人口上没有多出多少。所以大家应该想，一个开放二孩的政策和一个维持生育政策不动的政策，居然结果是一样的，出什么问题了？实际上就是说那个预测是按照1.8的生育率往下做的。这个形势判断错了，那么后面的决策依据的都是这个。曾老师假设生育率1.6，所以他还二孩政策就有空间，为什么说原来至少30年不能动，那是预测发生了重大的失误。用这次普查结果，我们不加任何调整的话，连1.5都没有。

第二点，涉及到周绍杰刚才讲的，我评论一下。在用联合国的预测，联合国的预测跟中国的预测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联合国是联合各国政府的联合国，而不是联合各国人民和联合各国专家的联合国，都是政府说了算的，联合国现在可能在六普以后，可能会调生育率，应该说其他来源大的人口的预测，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包括人口咨询局，早就寥寥无几了，而联合国做的预测，基本上还在1.7，跟咱们国家是对着的，所以你们要用这个，恐怕半年之内肯定看到它变。

**曾毅：**我回应一下刚才王丰老师的问题。为什么人口政策调整这么难？我觉得长期以来，人口分母在整个社会根深蒂固，包括很多院士，特别是自然科学家。我们跟他们交谈，他们也反映，就是人口太多了，必须严格控制。可是时代不同了。所以我建议在座的应该发挥我们聪明才智，改变这种人口越少越好的观点，或者是越严越好的这种偏见。

\*\*\*\*\*